

杨德山 刘建美◎编著

中共党史

简明读本

ZHONG GONG DANG SHI
JIAN MING DU BEN

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付出最大牺牲，作出最大贡献。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华文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
一、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	1
二、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4
三、 党的二大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6
四、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8
第二章 国共合作与大革命洪流	12
一、 党的三大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	12
二、 大革命高潮的兴起	14
三、 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大革命的失败	20
第三章 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	24
一、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24
二、 井冈山的斗争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	27
三、 革命运动的发展与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29
四、 “左”倾错误危害，革命遭遇挫折	33
五、 遵义会议召开，红军长征胜利	36
六、 为实现民族抗战而斗争	39
第四章 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	41
一、 全民族抗战的开始和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41
二、 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和持久战方针	43
三、 开展敌后游击战，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	46
四、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形成	48
五、 抗日根据地建设，延安整风运动	51
六、 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与抗战最后胜利	53
第五章 全国解放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56
一、 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56
二、 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59
三、 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62
四、 伟大的战略决战	65
五、 筹建新中国	69
第六章 新政权巩固与社会主义改造	71

一、 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71
二、 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全面展开	75
三、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78
四、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文化、外交、党建工作	83
第七章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87
一、 党的八大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87
二、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92
三、 纠“左”过程中的曲折	96
四、 国民经济的调整	98
五、 国内外形势变化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00
六、 十年建设成就	103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内乱	105
一、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05
二、 陷入“全面内乱”	109
三、 林彪集团覆灭，纠“左”努力受挫	115
四、 全面整顿及遭遇曲折	119
五、 “四人帮”集团覆灭，“文化大革命”结束	121
第九章 在徘徊中前进	123
一、 揭批“四人帮”和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	123
二、 “两个凡是”和各项工作的徘徊	126
三、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29
第十章 伟大的历史转折	131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31
二、 完成拨乱反正任务，确立四项基本原则	133
三、 新“八字方针”与改革开放起步	136
四、 改革开放初期各方面的新面貌	140
第十一章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	144
一、 党的十二大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创	144
二、 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146
三、 民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各方面改革和发展成就	149
四、 党的十三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	153

五、 价格改革、治理整顿和政治风波	155
六、 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全面贯彻基本路线	159
第十二章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164
一、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	164
二、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与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	166
三、 召开迈向新世纪的党的十五大	169
四、 邓小平理论	170
五、 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	171
六、 “新的伟大工程”、“三讲”教育活动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针	175
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76
第十三章 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178
一、 党的十六大与新世纪之初的行动纲领	178
二、 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开创伟大事业新局面	179
三、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182
四、 科学发展观	184
五、 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党的十七大	186
后记	187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一、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上下求索，艰难追寻。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开始睁眼看世界，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醒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以对付西方侵略者的主张，对内则提出振奋民气、兴利除弊的改革设想。但是，他们学习西方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野的认同，对内改革也未得到响应。

洪秀全等人发动和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前期以《天朝田亩制度》为追求，努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农业空想社会主义除了能激发贫苦农民投身起义造反外，根本无法成为现实。后期洪秀全还支持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纲领《资政新篇》，但并没有也无力付诸实施。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经历，都使曾国藩、李鸿章等朝廷重臣为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所震慑。于是，他们“采西学”、“制洋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先后办起了一些军工和民用企业，刺激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自己的宗旨，是想用西方先进技术这个“用”，来维护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制度这个“体”。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以英国为标准，效法日、俄，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清廷皇族责任内阁的建立，表明它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行皇族集权之实。

与立宪派同时诞生的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共和

国。他们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最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在这个反动集团的统治下，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

这些历史事实说明，近代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都无法承担起民族振兴的重任。

19世纪中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出现于国际资本主义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清朝官僚所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中。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国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具有改变自己的悲惨境遇的强烈要求；它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这种状况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产业工人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这些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特别能战斗的、最革命的阶级。辛亥革命以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到1919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已有200万人左右，工人斗争的规模也随之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辛亥革命的失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尤其是专制文化的复辟，促使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启蒙运动来挽救中华民族，这场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独秀也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1917年11月，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劳农专政的政治制度，以及苏维埃政权对中国友好的外交姿态，都吸引了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的关注，

也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李大钊在 1918 年就开始介绍和评价十月革命，并由此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为中共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1919 年 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了几项合理的要求。但是，操纵巴黎和会的列强拒绝中国的正义要求，原先被德国在山东强占的领土、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特权，都归日本继承。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5 月 4 日下午，北京大学等 13 所大专学校 3000 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北洋政府出动武装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

为抗议反动政府的镇压和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从 5 月 5 日起进行总罢课。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罢市、罢工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5 月 7 日，被捕的 32 名学生全部获释。9 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被迫辞职出走。北京学生强烈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各校教职员也同学生一起参加斗争。19 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再次总罢课。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6 月 4 日，上海学联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各界“主持公理，速起救援”。5 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北京学生。在工人阶级的带动下，上海出现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斗争局面。随之，全国兴起罢工风潮，商人罢市也遍及各地城镇。五四爱国运动已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以工人为主力、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爱国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先进青年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感到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难以忍受，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积极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之后，各

地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传播新思想的刊物也有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在各种学说竞起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二、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就开始探索和酝酿建党事宜。4月，俄共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

同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10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劫、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同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包惠僧为书记。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陈独秀等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为负责人。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但它们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这些组织从创办时起，就开始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党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维经斯基回国不久，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7月23日，来自各地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

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由于法国的共产主义小组还没有和国内取得联系，所以未派代表出席）推举的代表共12人，分别是：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斯基列席了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7月30日晚，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因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议被迫中断。31日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南湖，会议首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它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会议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议》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要求对现有其他政党采取独立政策，并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最后，党的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三人组成党的中央局。

党的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三、 党的二大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签署“九国公约”，核心是肯定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名义上是要尊重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实际上是列强在承认美国占优的前提下，共同统治中国，并限制日本独占图谋，防止英日结盟。这给中国政治局势带来了重大影响，军阀混战加剧。如此局面，国人忧心忡忡，提出各种解决时局的主张：控制中央政权的军阀鼓吹“武力统一”，地方军阀则要求“自治”或“联省自治”，改良主义者设计“好人政府”，孙中山重新举起“护法”旗帜。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出远东各被压迫国家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

命。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把会议的精神带回了国内，为党的二大制定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奋斗纲领提供了理论和策略依据。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党的中央局成员、地方组织的代表等共12人，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邓中夏、施存统、王尽美、邓恩铭、项英、向警予、高君宇和张太雷。他们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鉴于党的一大曾遭到法租界巡捕破坏的教训，二大只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其余时间则分组进行讨论。

大会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议会行动》、《工会运动与共产党》、《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少年运动问题》、《妇女运动》和《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等九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决定出版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蔡和森担任主编。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李大钊、向警予（女）为候补委员。陈独秀被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为委员长，张国焘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蔡和森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向警予为中央妇女部部长。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指出：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宣言实际上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

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党的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党的一大之后，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明显提高，罢工斗争蓬勃兴起。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

——香港海员罢工。在香港的中国海员长期生活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惨遭资本家、包工头的剥削和种族歧视，工时长、劳动强度大、工资少、工资待遇不及白人海员的五分之一。1921年3月，苏兆征、林伟民等在香港组建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1922年1月12日，在第三次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被无理拒绝后，香港中国海员忍无可忍，在海员工会联合总会的组织领导下，开始举行大罢工。短短一个星期内，罢工规模迅速扩大，海员纷纷从香港返回广州。广州各工会给了香港海员以积极的支持和协助。从1月底开始，香港运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罢工使五条太平洋航线和九条近海航线陷于瘫痪。

中国共产党对这次罢工极为重视，在广州组织成立了香港罢工后援会，做返穗工人的后盾。广东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组织全体党、团员参加接待和其他各项工作，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及时对罢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全国工人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

港英殖民当局采取离间、恫吓、威胁手段对待罢工海员，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派出武装军警实行戒严，封闭海员工会会所，逮捕罢工领导人，此举更激起了海员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义愤。从2月初起，罢工从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斗争。3月4日，数千名罢工工人徒步经沙田返回广州，港英

军警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扫射，当即打死 6 人，打伤工人一批，造成震惊中外的“沙田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广大工人和各阶层群众的强烈义愤，纷纷提出强烈抗议。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迫于形势，不得不向工人屈服，答应了海员工人的基本要求。

3 月 8 日，罢工宣告胜利结束，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气焰，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是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合称。萍乡煤矿是当时最大的受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官僚买办企业汉冶萍公司的主要厂矿之一。路矿两局共有工人 1 7 万余人，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的压榨下，生活处境悲惨。

1921 年秋，时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的毛泽东来到安源进行社会调查。随后，党又派李立三常驻安源，在工人中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和共产党支部，成立了工人俱乐部。1922 年 9 月初，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其时，资本家请萍乡县署正式布告查封俱乐部。路矿当局一连三月拖欠工人工资，工人生活陷入绝境。毛泽东直接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要求党支部有勇有谋地领导工人坚持斗争，并从安源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哀而动人”的口号。

会后，党组织又派刘少奇来安源，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9 日，俱乐部向路矿当局提出保护俱乐部、发清欠饷等三项最低限度要求，限 12 日午前答复。并在报纸上发表致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全国各工团的快邮代电，吁请援助。14 日零时，俱乐部向全体工人发出罢工命令。至午前，除生活和安全部门外，路矿两局 1 3 万余工人全面实行大罢工。工人们挫败路矿当局收买工贼复工、企图暗杀李立三等阴谋。党又派出刘少奇为代表与路矿当局进行谈判，迫使他们答应了工人提出的 13 项条件。18 日早晨，双方在罢工条件上签字，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成为中国工运史上的一次壮举。

——开滦五矿大罢工。开滦煤矿公司由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五矿组合而成，原为官僚资本所创办，后被英帝国主义

者侵吞。矿工们受着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有“人命一条，不如一马”之说。1922年，在全国罢工风潮鼓舞下，尤其是在山海关、唐山铁路南厂罢工胜利的影响下，开滦矿工纷纷要求组织起来，为获得政治自由和经济解放而斗争。10月16日，开滦五矿推举赵芯峰、李星昌等八名代表，向矿方提出了改善生活待遇的六项要求，被矿局无理拒绝。10月19日，在中共唐山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以罗章龙、王尽美、邓培等及各矿工人代表20人组成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委员会成立。10月22日，林西矿的请愿工人代表被矿方无理扣留。代表们极为愤怒，决定10月23日举行总罢工。

10月23日早晨6时，五矿工人同时罢工，数千工人举行大集会、大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劳工神圣”、“要求经济解放”、“打倒一切剥削者”等口号。

五矿总同盟罢工的发展，引起了中外反动派的恐惧。10月24日，矿局资本家就一连发出三封电报，催天津方面急速派兵来唐山援助。直隶全省警务处长杨以德密谋调遣3000军警，英国来福枪队开进矿区，图谋武力镇压。10月5日，林西、赵各庄矿工纠察队以集体卧轨的壮烈行动抵抗英兵来矿。10月26日，各矿工人继续集会，并到街头进行演讲。反动军警无理逮捕纠察队员七名，以武装进行镇压。为了反抗这种暴行，矿工们聚集到警察门前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工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反动军警向工人开枪射击，造成了伤64人的惨案。

血腥镇压没有吓倒英勇的开滦工人，他们决心把罢工斗争进行到底。在全国各地工人兄弟广泛地同情与支持下，五矿工人继续坚持斗争达25天之久。最后迫使开滦矿务局和直隶全省警务处不得不张贴布告，应允给百元以下的工人增资10%，工人罢工期间发给七天的工资，并由矿局担负医药费。这次罢工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是却再次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2年年底，京汉铁路各站已经建立了16个工会分会，成立全铁路统一的工会组织成为工人的迫切要求。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在开会前夕，直系军阀吴佩孚竟下令禁止开会，工人们对于军阀的无理行动，表示极大的愤慨，决定照常召开成立大会。2月1日，吴佩孚派军警包围会场，到达郑州的大会代表冲破了军警的阻拦，进入会场，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开会不久，代表们与军警发生冲突。会后，反动军警又包围了代表的住处，监视代表行动，占领、封闭、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的会址，代表们被强迫出境。当晚，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京汉铁路全体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为了便于指挥这次罢工斗争，总工会移至汉口江岸办公。从2月4日上午9时起，仅用3个小时就实现了全路2万名工人全部罢工，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1200公里京汉铁路立即瘫痪。这次罢工主要领导人有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育南等。

2月7日，曹锟、吴佩孚等派大批军警分别在长辛店、郑州和武汉江岸等处进行血腥镇压。湖北督军肖耀南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会代表到江岸工会会所“谈判”，工会代表在去工会办事处途中，遭到反动军队的枪击，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当场被打死30多人、打伤2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惨遭杀害。

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而战，打倒军阀。全国各地掀起了打倒军阀、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运动。罢工斗争坚持到2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武汉工团联合会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忍痛下令复工，大罢工宣告结束。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工人阶级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激发了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军阀斗争的意志。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各地军阀也都对工人运动采取了高压政策，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被迫暂时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人由此也清楚地意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党的三大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

第二章 国共合作与大革命洪流

一、党的三大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经过两天激烈的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共产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九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五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调职，改为王荷波）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迅速扩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大革命作了准备。

党的三大之后，国共合作步伐加快。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动员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国民党。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必须与共产党政治上保持一致。11月24日，党的三届一次中执委会议召开，要求全党以扩大国民党组织和改变自身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其次，南方革命形势变化，国民革命进一步发展有了坚实的条件。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大本营后，滇、桂联军打败陈炯明、沈鸿英进攻，控制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并拥有数万人军队。最后，1923年10月，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应孙中山之邀到广州，具体指导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在多方力量的努力下，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65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23名为共产党员。孙中山主持了大会。

大会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成为国共合作的基础，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同意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工作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很快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从组织发展看，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组织迅速发展，短短两年内，国民党就有了11个正式省党部，四个特别市党部，还有八个筹备中的省党部，从而打破了它原来只在少数几个省市和海外有党部的格局；党员人数也达到了20万之多；党员结构中，工农和青年党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与此同时，共产党的组织规模和影响也有了较大的发展。1925年5月，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组织的工人约有54万人。

国民党一大决定学习苏俄的建军经验，筹办陆军军官学校。学校校址设在广州市郊黄埔岛，故又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苏联政府在支付办学经费、供给军需物资、派遣军事教官等方面，给予了黄埔军校很大的帮助。

不久，国民党便以军校师生为骨干，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开始建立和发展国民革命军。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1924年11月，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对军校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后来也到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和领导工作。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周恩来和广东区委从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为骨干，组建大本营铁甲车队，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后编入叶挺独立团。